

民本书系

KEWANG SHENGCUN

渴望生存

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

周大鸣 著

渴望生存的农民工，
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沿海，

走向陌生的工厂、工地，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搭建起中国现代化的脚手架！

那不断往返于输入地和输出地的人流，就像那永恒的钟摆；

那难以改变的“外来人”的身份，

只能与“本地人”在同一空间构成“二元社区”。

这些是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本书作者对农民工跟踪研究近20年，

书中展示了农民工流动的过程、特征和规律，

对流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中山大学出版社

民本书系：

《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

《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

《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

《“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

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

渴望生存的农民工，

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沿海，

走向陌生的工厂、工地，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搭建起中国现代化的脚手架！

那不断往返于输入地和输出地的人流，就像那永恒的钟摆；

那难以改变的“外来人”的身份，

只能与“本地人”在同一空间构成“二元社区”

这些是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本书作者对农民工跟踪研究近20年，

书中展示了农民工流动的过程、特征和规律，

对流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中山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捷

封面设计：孔丽红

责任校对：吴其晖

责任技编：黄少伟

ISBN 7-306-02461-2
D·251 定价：25.00元

ISBN 7-306-02461-2



9 787306 024619 >

民本书系

渴望生存

——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

周大鸣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 目录

第一章 农民工研究的回顾：理论与实践	(1)
一、农民工研究的缘起	(2)
(一) 城市	(3)
(二) 乡村	(3)
(三)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	(4)
二、农民工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	(4)
(一) 劳动力乡-城流动及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研究	(4)
(二) 农民工角色	(11)
(三)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	(23)
(四) 农民工的教育与管理	(26)
(五) 农民工与中国城市化	(30)
三、对农民工研究的不足之处	(37)
第二章 珠江三角洲人口移动研究	(39)
一、珠江三角洲人口移动的规模与类型	(40)
(一) 本区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41)
(二) 短期流动人口	(42)
(三) 区外劳动人口向三角洲的流动	(43)

二、珠江三角洲人口移动与文化适应	(53)
三、外来劳动人口的控制与管理	(58)
第三章 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散工”研究	(64)
一、“散工”研究的方法	(66)
二、“散工”都市经历的调查与分析	(69)
(一)“散工”的人口学特征	(69)
(二)“散工”的工作情况	(71)
(三)“散工”的生活状况	(75)
(四)“散工”的社会关系	(77)
(五)“散工”的将来计划	(81)
三、结果与讨论	(83)
第四章 农民工外出对输出地的影响	(86)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86)
二、农民工流动对输出地的影响	(87)
(一)对输出地社会结构的影响	(87)
(二)对输出地生活方式的影响	(90)
(三)对输出地经济结构的影响	(90)
第五章 农民工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	(93)
一、外来务工群体特征	(94)
二、调查点外出务工的基本情况	(95)
三、外出务工者与输出地的联系	(102)
四、多维力量参与的政治结构变迁	(104)
五、结果与讨论	(109)

第六章 农民工的性别分工·····	(110)
一、性别的分野体现·····	(110)
二、女性在劳动性别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112)
三、性别分工使女性总是处于社会分配制度的边缘·····	(115)
四、结果与讨论·····	(117)
第七章 从农民眼中看农民工和适应过程·····	(118)
一、早期的农民工与外出动力·····	(118)
二、农民工的适应能力·····	(131)
三、农民工的成功与挫折·····	(141)
四、结果与讨论·····	(148)
第八章 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150)
一、农民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	(150)
二、外出务工与个人现代性获得·····	(154)
三、简短的结论·····	(158)
第九章 雇用廉价外来劳工与“原始积累”·····	(159)
一、珠江三角洲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比较·····	(159)
二、社会主义也需要积累·····	(164)
三、进一步的讨论·····	(168)
第十章 梯级移动：农民工流动的个案分析·····	(172)
一、钟水村：劳动力输出地·····	(173)
二、宁村：劳动力输入地·····	(177)

三、凤凰村：既是输出地又是输入地·····	(184)
四、结论·····	(187)
第十一章 二元社区：外来劳动人口的双重效应·····	(189)
一、外来工进入珠江三角洲的过程与地理分布·····	(189)
二、珠江三角洲村镇二元社区的形成·····	(192)
三、问题与讨论·····	(195)
(一) 二元社区形成的原因·····	(195)
(二) 二元社区所引发的问题·····	(196)
第十二章 沿海城市外来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流动人口的综合治理·····	(200)
一、城市民族现状·····	(200)
二、深圳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	(202)
(一) 深圳少数民族的来源渠道·····	(203)
(二) 深圳少数民族的居住模式·····	(204)
(三) 深圳少数民族的社会网络·····	(205)
(四) 城市少数民族族际交往的特点·····	(206)
三、广州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治理·····	(209)
(一) 广州H区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概况·····	(209)
(二) 治理的有效性和不足·····	(211)
(三) 关于做好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的几点思考·····	(215)
四、结论·····	(218)
第十三章 钟摆理论：农民工流动的科学解释·····	(220)
一、钟摆理论的提出·····	(220)
二、钟摆理论模型和因素分析·····	(224)

三、二元社区、钟摆效应的负作用·····	(228)
四、对策和建议·····	(231)
附录·····	(234)
附录 1 本地人与外来工——汕头贵屿镇调查报告 ···	(234)
附录 2 2002 年广东省外来工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	(274)
参考文献·····	(309)
后记·····	(323)

■ 第一章

农民工研究的回顾：理论与实践

笔者自 1986 年开始关注农民工流动问题，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初期主要探讨珠江三角洲流动民工的分类、规模和分布；随后关注流动民工引起的相关问题，如流动民工与乡村都市化；后来又将流动民工与社区综合起来研究，如就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提出“都市包围中的村庄”等，根据“推拉”理论提出了“梯级移民”、“输入地”与“输出地”的比较研究等课题。接着对农民工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二元社区”、“钟摆理论”以阐释当代中国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流动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不仅持续的时间长，参与的学科多，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人口学、城市学、医学等，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有着学术和应用价值的论著，内容涉及农民工群体的方方面面。下文结合笔者个人的研究经历，并参照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研究，通过研究缘起、研究内容、研究不足三部分，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农民工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反思。^①

^① 秦红增博士协助本章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特此鸣谢！

一、农民工研究的缘起

农民工，又称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通常简称农民工。不过严格说来，农民工涵盖的范围较广，既包括“离土不离乡者”的乡镇企业工人，“不离土也不离乡者”、“不离土却离乡者”的农场或种植大户的雇工，也有“离土又离乡者”的进城农民工。其中以进城农民工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并形成了独特的“农民工”群体。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资源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换为家庭。家庭承包制既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取消了过去强加在农民身上不准离开土地的行政性限制，打破了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也使长期以来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出来，农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总数达2亿多。

20世纪8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为载体，采取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内部就地转移方式。据统计，1978~1992年期间，乡镇企业共吸收了7500多万农村劳动力。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由于技术进步加快，资本密集程度的迅速提高，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乡镇工业总产值每增长1%，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百分比，从1978~1984年的0.57%，下降到1992年的0.15%。1984~1988年期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收1260万农村劳动力，而1989~1992年平均每年只吸收260万人。因而在9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便采取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转移方式（《中国农村经济》评论员，1994；宋林飞，1995）。

规模性的农民工群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后急剧扩大，至中期达到高潮，目前全国常年跨区域流动着的

大约有 8000 多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15% ~ 20%。他们主要来自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仅珠江三角洲常年流动的农民工就有 1000 多万。如此众多的人员涌入城市，既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新的问题，反过来也使农民工面临着自身的角色转换和城市适应问题（周大鸣，1996，1997c，1999a，1999b）。

（一）城市

问题

农民工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加剧了城市基础建设的负荷，给市民生活造成了某些不便，特别是交通方面；二是会与下岗工人抢饭碗，给城市造成更大的就业压力，对正在发育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不利的影响和冲击；三是从业复杂，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管理难度大，使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犯罪率明显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难以实施等（《中国农村经济》评论员，1994；吴权，1996）。

（二）乡村

问题

主要是大量农民外出，尤其是中青年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外出，迫使非劳动年龄人口和有着繁重家务的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下降。劳动部就业司 1995 年的调查发现，种植业中女性劳动力的比例已超过 55.9%；2000 年进行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 82.1%，比男性高 17.4 个百分点。还有就是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使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对家庭养老的弱化作用明显。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超过了城镇，农村为 7.35%，城镇为 6.30%（周大鸣，1999b；徐林清，2002b；马

用浩, 2002)。

(三)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 也是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 即城市适应和个人角色转换的过程。但由于多种原因, 这一过程却很难完成, 从而直接影响到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和谐或稳定关系的建立, 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 学者们首先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工农业的比较利益、中国都市化前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乡村发展等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群体跨区域流动的合理性、现实性, 并一致认为,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乡村都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主流是应该肯定的。其次, 对各种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问题做了较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总起来说, 农民工的研究体现了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统一。

二、农民工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

研究围绕农民工群体跨区域流动的问题与对策, 在内容上可分为五大类。

(一) 劳动力乡 - 城流动及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研究

此类研究重点探讨了农民工进城的原因, 进城后农民工的就业及职业流动问题。

1. 劳动力乡 - 城流动动因

农民工进城就业也是个世界性的现象, 它早就引起了西方经

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并提出了多种关于农民工进城的理论解释。如雷文斯代、厄文特李的“推-拉”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托达罗的期望收入理论，舒尔茨的“三态论”等（周大鸣，1997a；文军，2001）。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推-拉”理论。学者们也运用这一理论较好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劳动力乡-城流动的推力和拉力，及流动中的障碍因素。此外，部分学者则关注了农民工进城的理性动因。

(1) 推力与拉力。农民工进城是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的合力结果，同时由于农村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十分弱小，因此，两种力量相权衡，还是农村中的推力所起的作用更大些。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产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学者们认为，与农村非农产业相比，与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当农民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离农倾向。这首先表现在人均收入总量差别上。据住户调查，1993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为2.6: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社会福利和住房补贴等，在农民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负担后，实际的城乡差距可能达到4倍以上。其次，表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差别上。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比，1990年为2.2:1，1993年为3.1:1。城市20%蹬高收入户与农村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比高达十多倍。

另外还有地区比较利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扩大，以农民收入为例，1983年，若以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为100，则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126和144，1992年，这一比例变成了100:115:166。农民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相比，差距由1983年的2.69倍扩大到4.49倍。不管是贫困还是够温饱的中西部农民，都受到东部相对高收入的吸引，纷纷到沿海地区“淘金”。

对农民工的调查结果也与此相一致。属于农村“推”的因素有三个：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太穷，属于城市“拉”的因素有两个：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可见，经济收入的驱动力是驱使大量农民工外出的基本动力。

学者们也关注了农民工进城动因中的非经济因素。20世纪80年代，农民通常是与过去没有承包土地时相比，而不是做横向比较。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与外出的老乡比较，甚至与城里人比较，所以“见世面”和“发展机会”就变得重要起来。在调查中，“外出见世面”占有较高位次，选择比例也均超过了50%；“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所填答的百分比为34%~35%（宋林飞，1995；杨宏山，1995；廖九如，1995；欧阳雪梅、谢海荣，1996；李强，2003）。

总之，农民工外出的动因已日趋多样化，本人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婚姻的驱动力、建房的驱动力、见世面的驱动力、外出“镀金”的驱动力、创业的驱动力，基本涵盖了农民工进城动因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周大鸣，1999b）。

（2）障碍因素。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将社会成员的身份和职业固定起来，使农民长期被限制在农村里，固定在土地上，从而有效地阻隔了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但二元结构中最重要户籍制度却一直没有大规模的质的变化。

户籍制度的核心，一是属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1984年，中央提出农村工业可适当集中于集镇，并进行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试点；1985年，首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但这时候的户籍政策仅是允许农民在小的“集镇”定居，并不允许农民在各级城市里

正式定居；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严格控制政策，户籍制度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蔽（徐林清，2002a；李强，2003）。

（3）理性动因结构。有些学者运用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来探讨劳动力乡-城流动的理性动因结构，认为农民工一开始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化的活动中挣得更多的现金收入，但他们也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生存原则）→经济理性选择（最优原则）→社会理性选择（满意原则），但主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的影响，“经济理性选择”还一时难以在中国农民身上首先发挥效应，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则对解决温饱的农民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当前中国农民外出就业，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跃迁的过程，“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是农村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他层次的需要凸显。所以，与推-拉理论与实证分析相比较，理性动因结构分析更多地关注了农民工进城动因中的非经济因素（黄平，1997；文军，2001）。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动因也支持了理性动因论。务农没有出息，已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持有这样的看法。更多的农村青年还觉得家乡太落后，自己已习惯了外面的生活，适应不了农村的环境脏、娱乐活动少、社会圈子狭窄的情况（王春光，2001）。

2. 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模式

(1)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农民工进城后首要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份职业。市场改革以来，允许自由流动的农民工自己寻找赚钱的机会，从而形成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特点：①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市场上的职业结构都是体力劳动型的，其收入明显低于总体工资水平，其待遇和劳动环境是比较差的；②跨度大，农民工流动遍及全国范围，常常是跨区域、跨省际的；③循环流动性，即农民工每年从农村流入城市，再从城市流入农村，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又具有明显的季节性；④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⑤市场体制不完善，如没有固定的场所、缺乏规范等。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①交易双方。农民工一方基本都是受雇者，另一方是雇用农民工的单位或个人。作为受雇者的农民工是一支经济活动能力极强的队伍，在年龄结构、教育程度上比农村一般农民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雇用者之所以愿雇农民工的主要原因是，与正式职工相比较，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低廉，且无须终身制，从而可以实施真正的自由雇用制度。②市场中介。虽然在一些城市中，各级政府组织加强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和服务，但总体上，农民工劳动力的市场中介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没有正常的市场中介，雇主与农民工双方都对对方有不信任感，自身有不安全感。③交易规则和交易过程，交易场所不固定，交易无契约，规则是非规范的。

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制：农民工进入市场，虽然还处在比较初级的劳动力市场阶段，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个人的行为还是理性行为，不是盲目行为；农民工主要是从先一步进入城市的同乡、朋友、亲属那里获得就业信息的，依靠熟人找工作；政府在农民工进入市场的问题上远远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再加上没有医疗住房等各种福利，与城市职工的差距是较大的。

因此，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目前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各方面有待完善（李强，2000，2001a）。

（2）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学者们认为，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模式。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没有取得正式就业的身份、地位不很稳定的就业。对于农民工来说，主要指两种情况：一种是临时工，虽然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是正式单位，但所做的只是临时的工作，与正式职工在收入、福利上均有明显差别；另一种是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本身就是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性的非正式的单位或非正规部门。

中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次属性密切相关。其特点主要在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非正规就业主要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作为临时工的农民工，与单位正式职工处在完全不同的职业和工资体系；除了工资外，农民工不享受任何福利保障；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雇用纠纷时常发生，且经济收入往往脱离税务管理；就业不稳定，农民工工作更换频繁。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正面功能体现在：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节省了城市就业的岗位成本；劳动效率高；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务。

在性质上，非正规就业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的，不是违法就业，不应该采取打击、压制手段，但规范化程度不高，因此应加强“精细”的管理，采取扶持、帮助的对策，加强对农民工